

差序格局是一种国家内文化吗？

——中国地区差序文化的指标开发与验证、异质性分布及其影响*

□ 赵璞初 秦 昕 陈 晨 李琬璐 关 健 甘雨青

领域编辑推荐语：

“差序格局概念一经提出，影响深远。本文率先为差序文化的地区异质性提供了理论解释、经验证据和方法论工具，为差序格局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贾良定

摘 要：“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科学应用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本土概念，但主流研究大多将它视为中国社会泛在性的文化特征，隐含假定它在中国各地区（例如省份）之间是同质的。对此，本文基于文化演化视角，探索差序文化省际异质性的存在性，以及这种异质性与当代省际不平衡发展的内在联系。在实证阶段，在开发出省际差序文化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对研究假设开展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差序文化在中国内部呈现出以“局部趋同，整体趋异”为特征的省际异质性；第二，这种异质性对于理解省际不平衡发展是重要的，它广泛解释了各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差异。本文率先为差序文化的地区异质性提供了理论解释、经验证据和方法论工具，对于推动面向实证的差序格局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差序格局；文化；地区文化差异；信任；测量指标开发

一、问题提出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组织如何提高和‘提防’谦卑型领导？基于其前因和潜在阴暗面的多层次、多方法研究”（71872190）、“天才皆孤独？基于排斥者视角的道德许可与心理福利效应研究”（71702202）和“为什么上司要公平地对待下属？一个基于态度功能的视角”（7150217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排斥他人会让自己感到特别吗？职场排斥行为对排斥者自身的影响研究”（19wkpy17）的资助。笔者感谢编委、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李新春教授和 BUT 组会成员对论文修改提供的宝贵建议。

(马戎, 2007; 翟学伟, 2009)。宽泛而言, 差序格局是指与个体相关联的亲疏有分、内外有别的人际关系特征。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是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相对照, 以反映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模式(费孝通, 2008)。正因为对本土人际文化内涵的精确概括, 差序格局不仅为“人情”“关系”“圈子”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提供了启发和参照(胡安宁, 2018; 周飞舟, 2015), 也为理解中国的公司治理(刘春等, 2016)、家族企业行为(王明琳等, 2014)、创业活动(Peng, 2004)等组织管理现象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时至今日, 差序格局已经成为分析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组织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孙立平, 1996; 翟学伟, 2009)。

综观现有研究对差序格局的应用, 在极大挖掘差序格局理论价值的同时, 许多研究者习惯将差序格局表述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强调它在中国内部的泛在性和普适性。例如, 相关理论文献大多明确指出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卜长莉, 2003; 孙立平, 1996; 阎云翔, 2006; 翟学伟, 2009; 郑伯坝, 2006; 周飞舟, 2015)。许多组织管理的实证研究在应用差序格局时, 也强调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这些研究广泛涵盖了战略管理(王明琳等, 2014; 祝振铎等, 2018)、公司治理(刘春等, 2016; 潘越等, 2019)、市场营销(童泽林等, 2015; 庄贵军和席酉民, 2003)和组织行为(刘军等, 2009; 薛亦伦等, 2016)等领域。

然而, 将差序格局被视为中国社会普适性的文化特征可能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 这种简化隐含假设了差序格局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具有

同质性, 而没有考虑中国内部地理区隔所导致的文化差异性, 以及这种差异性的重要影响。大量区域文化差异的研究表明, 文化在国家内的各地区(省份、郡、州)间存在系统性变异(Gelfand et al., 2011;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 Schulz et al., 2019; Talhelm & Oishi, 2019), 特定文化的国家内变异甚至会大于国家间变异(Tung, 2008)。中国疆域之广、人口之众、历史之悠久(许倬云, 2006), 文化的国家内变异的情况可能尤为明显。例如, 新近研究显示, 中国各省份在集体主义、文化松紧度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Chua et al., 2019; Talhelm et al., 2014)。以此推之, 差序格局作为一种文化模式, 在中国各地区间同样可能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分布。进一步地, 针对文化的国家内变异, 美国管理学会的前任主席 Rosalie Tung 强调它“具有重要理论价值”(2008: 41)。正如许多证据所揭示的, 文化的国家内变异常常对一国各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如政治模式、健康水平、创新产出)的不平衡发展产生直接影响(Chua et al., 2019;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 Vandello & Cohen, 1999)。

基于此, 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第一, 差序格局文化(以下简称差序文化)在中国各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分布? 第二, 如果是, 这种异质性分布是否重要, 即它对于解释各地区不平衡发展是否有帮助? 解决以上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有助于厘清差序格局理论的边界条件, 并促进理解差序格局现象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潜在关联。

回答以上问题面临方法上的挑战, 即如何

测量地区的差序文化。虽然许多研究使用“差序格局”概念来分析中国或地方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但是由于缺少地区层面的测量方法,真正将差序格局作为变量纳入实证分析的研究寥寥无几。对此,一些研究尝试使用“家族主义”(吴超鹏等,2019)、“宗族文化”(潘越等,2019)等变量作为近似替代变量,将差序格局的文化研究从定性推进至定量层面。然而,这种间接的测量方法可能造成概念间的混淆,也难以将差序格局的实质含义和理论财富直接传递至可证伪的经验层面(Hu,2017)。基于上述研究问题和背景,本文根据差序格局的内涵与文化起源,从文化演化的视角来分析差序文化的地区异质性何以形成与持续。进一步地,根据差序文化的“内聚”和“外斥”两种作用逻辑,探讨差序文化与当代省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上的关联。在实证部分,开发出一套省际差序文化的指标构建与验证体系,首次构建中国31个省份的差序文化指数,进而实证检验差序文化的省际异质性分布的存在性及其对省际不平衡发展的解释能力。

本文是极少数将“差序格局”概念纳入实证分析的研究,对差序格局文献具有三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率先为差序文化地区异质性的存在性及其成因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通过引入文化的国家内变异视角(Tung,2008),挑战了现有研究有关差序格局国家内同质性分布的隐含假设,勾勒出差序格局文化理论的边界条件。第二,开发出省际差序文化的测量指标,对差序格局的发展做出了实质贡献,为今后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分析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工具。第三,揭示出差

序文化与当代地区发展间广泛而辩证的内在联系,不仅验证了差序格局对中国广泛社会现象独特的解释能力(费孝通,2008),也揭示出差序格局“重私德而轻公德,凝聚圈内人而排斥圈外人”的两面性(肖瑛,2014;郑伯坝,2006),从而为差序格局的这一利弊共存特征提供了宏观证据。

本文后续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介绍差序文化的指标构建方法和其他变量的测量方法;第四部分对前述假设开展检验;第五部分概括主要结论、理论贡献、实践启示、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差序格局的概念内涵与文化起源

学界普遍认为,差序格局“分析的核心对象是单个的人”(马戎,2007:141),讨论的是个体人际关系实践的结构特征和行为模式,其内涵可以通过“差等”和“序次”两个维度来展现(胡安宁,2018;翟学伟,2009)。“差等”重在反映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静态结构特征,即中国人的关系网络是以己为中心,依据关系强度的降序,由内向外辐射出不同的关系圈层(Chan,2009),例如家人、熟人和生人(黄光国,1985);在此基础上,“序次”进一步界定了个体在这一网络结构下动态的行为模式,强调个体会对不同关系圈层的人际对象予以区别对待,例如在分配资源时遵循亲疏远近的顺序模式(郑伯坝,2006)。

差序格局反映了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鲜明

存在的共性特征，它在中国以社会文化的形式存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费孝通，2008；周飞舟，2015）。然而，中国社会的差序文化起源于何处？对此，现有研究在细致考证后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盛行的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是差序文化产生的重要土壤（卜长莉，2003；阎明，2016；翟学伟，2009）。首先，中国自古便有以农为本的生产传统，依托农耕经济建立的乡土社会与差序格局具有天然的联系（费孝通，2008）。农耕工作“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地点相对固定，使人们的社会生活范围限制在宗亲邻里之间，缺少与外人接触的机会，从而塑造了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短半径信任网络（卜长莉，2003）。同时，农耕生产依赖集体合作，而乡土社会中最具效率和便利性的合作模式便是根据关系亲疏远近来缔结生产组织和开展劳动分工（阎明，2016），这又进一步引发了乡土社会内部的关系网络分层。可见，农耕经济为差序文化提供了萌发土壤。对此，Uskul 和 Over（2014）的研究给出了间接证据，他们发现虽然在遭受亲近之人排斥时，农民与牧民经历同等强度的负面情感，但是在遭受陌生人排斥时，农民经历的负面情感更少，说明农民比牧民在人际交往中具有更高的差序性。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派生了差序文化，这一观点已普遍为社会学界接受（翟学伟，2009）。根据费孝通（2008：30）的阐释，“（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些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儒家伦理既主张“爱有差等”，即“爱人”不可兼爱，而需依据关系亲疏逐次展开（卜长莉，2003），又强调人的伦序，明确规定

“个体对于四面八方之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的义务”（梁漱溟，2011：155）。这种伦理本位是支撑差序格局下关系实践的基本精神（周飞舟，2015；秦鹏飞，2020）。林端（2014）更是直接指出，差序格局的本质就是儒家伦理的内在逻辑在社会生活中的形式化或仪式化表现。

（二）差序文化地区异质性的形成与持续

为发展差序文化的地区异质性假设，我们援引地域文化学的文化演化视角（Kitayama et al., 2010；Oishi, 2014；Tahel & Oishi, 2019）。这一理论视角有两条基本原理：第一，文化是人类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适应外在环境的产物，地区的环境特征塑造了当地的文化特征。第二，文化能够自我复制，因此地区在远端时点上获得的文化特征可以通过代际延续到近端时点。两条原理都获得了经验证据的支持（综述参见 Kitayama et al., 2010；Tahel & Oishi, 2019）。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分析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何以形成与持续，理论逻辑如图1所示。

1. 差序文化地区异质性的形成

前已述及，农耕经济和儒家伦理是差序文化的重要前因。进一步地，由于中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进程差异很大，造成不同地区对农耕经济的依赖程度以及儒家伦理的普及程度存在客观差异，最终形塑了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

首先，农耕经济在不同地区的非均衡性对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具有长期塑造作用（见图1中的路径a和路径b）。农业耕种受到土壤、地势和气候条件等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故而各地随着自然环境不同，对农耕经济的依

赖程度有所差异（韩茂莉，2012）。例如，根据鲁西奇（2014）的研究，黄河中下游的旱作经济区由于地势平阔，土地易耕，农耕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相比之下，秦岭—淮河线以南的稻作经济区水资源丰富，有着发达渔猎产业作为替代，因此对农耕生产的依赖程度较低。即便在相同的经济区以内，由于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农耕经济的地区差异仍然存在。例如，

Talhelm 等（2014）的研究显示，处在中国稻作经济区的各省份在水稻种植适宜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并导致了这些省份水稻种植面积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地形、气候、水资源等自然环境具有长期不变性，中国农耕经济的地区差异在两千年来也是长期稳定的（鲁西奇，2014），所以能够持续为差序文化地区差异的形成创造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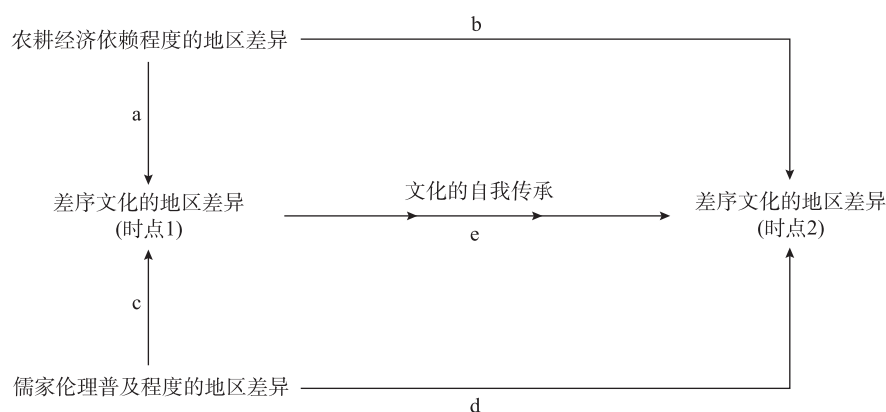


图 1 差序文化地区异质性的形成与持续

其次，儒家伦理在不同地区的普及程度差异同样长期形塑了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见图 1 中的路径 c 和路径 d）。自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王朝几乎全部奉行“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儒学就此与政治形成紧密联系，越是政治核心地区，儒学越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是被要求注意伦常（冯晨等，2019）。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政权的分布呈现出长期稳定的不均等性，因此各地区儒家伦理的普及程度有所差异。据鲁西奇（2014）考证，历代的儒家政权核心区基本稳定在关中、河洛、江淮、京津及周边地区，儒学在当地被奉为正统。相比

之下，对于一些边缘地区，中原王朝势力难以企及，因此受儒学影响较弱（冯晨等，2019）。例如，川渝、云贵地区处在边陲，又有崇山峻岭阻隔，儒家文化“长期只停留在大路的两旁，无法深入到高山深谷中”（赵向阳等，2015：109）。鉴于儒家伦理与差序格局之间的派生关系，各地区在儒家伦理普及程度上的长期差异持续形塑了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

2. 差序文化地区异质性的持续

除受到农耕经济、儒家文化地区差异的持续塑造作用（见图 1 中的路径 b 和路径 d）外，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还通过文化的自我传承机

制得以持续（见图1中的路径e）。文化的自我传承指的是文化“通过自我复制以达成历时性延续”（胡安宁，2020：145）。文化学研究表明，即便塑造文化的外在环境或历史条件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文化在人群中的异质性分布依然可以维持长时间平稳，并在当代被观察到（Schulz et al.，2019）。鉴于这一原因，传统社会遗留的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应该能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保存下来并延续至今。差序文化的自我传承主要通过家庭教育这一社会化过程来实现。Tabellini（2008）强调，家长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是文化代际传递最重要的渠道。就差序文化而言，强差序文化地区的家长更可能要求子女遵守“亲亲尊尊”的行动伦理，而弱差序文化地区的家长更可能向子女教导“一视同仁”的人际理念。丁从明等（2018）基于中国家庭追踪数据的研究提供了间接证据，发现对生人的信任水平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持久地形塑了南北方的信任模式差异。此外，差序文化还可以通过外显为稳定的社会叙事、礼仪习俗或行动规则（Kitayama et al.，2010），例如职场的人际潜规则，从而被年轻人学习模仿并不断传承。

综上所述，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在地区间的长期不均等性持续塑造了差序文化的地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又通过文化的自我传承而延续至今，能够被我们观察到。与以往中国地区文化差异的研究相同（Chua et al.，2019；Talhelm et al.，2014；Van de Vliert et al.，2013），我们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作为地区划分依据，提出假设：

假设1：差序文化在中国各省份之间存在异

质性分布。

（三）差序文化与省际发展的关系

文化作为隐性制度，通过塑造人们的行为模式对地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Giddens，1986）。本文在梳理差序格局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差序文化如何通过塑造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进而影响一省发展。

在中国，圈子现象是差序文化的典型体现。差序文化越强，人们越会将亲疏远近作为交往的基础和参考原则（黄光国，1985），进而将交往对象划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并施行差别对待（Yang，1995；郑伯坝，2006）。因此，一省的差序文化通过“内聚”和“外斥”两种机制分别塑造当地人民对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行动逻辑，而这种影响又会进一步传递至当地的发展指标上。

具体地，内聚机制表现为促进圈内形成紧密的人际网络、浓厚的信任氛围和强烈的情感认同，进而给圈内人带来两方面好处（Chan，2009；郑伯坝，2006）。第一，资源支持。高度信任、联系紧密的关系网有助于资源和信息在成员间高效传递，为成员提供低交易成本的资源融通渠道。此外，圈内的资源支持也激励着追求资源的圈外人积极融入圈内人。第二，非正式治理。圈内的情感认同促使成员荣辱与共，成员之间的声誉相互联系，因此群体容易衍生出更为严格、有效的非正式治理手段来规范成员的偏差行为。此外，有效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也会弱化成员对正式治理机制的诉求。据此，可以推测，差序文化将影响省内的资源获取活动、对偏差行为的治理以及公民对正式制度的诉求。

外斥机制表现为助长偏私对待、内外异法的关系模式，从而压缩圈外人的生存空间，圈外人更易遭遇疏离、不信任和不公平对待，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刘军等，2009；马戎，2007；郑伯埙，2006）。这些成本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合作成本。一方面，排外的文化环境不利于新合作关系的建立，因为圈内成员对不熟悉的外部合作者缺乏信任，意味着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更高成本。另一方面，这种环境也不利于跨部门合作的运行，因为合作网络容易分化为一个个圈子或利益单元，阻碍资源有效转移和整合。第二，融入成本。来自圈内人的疏离和不信任会导致圈外人感觉受到排斥，引发消极心理体验。据此，可以推测，差序文

化将影响合作关系的建立与运作以及外来群体的融入。

基于以上理论框架，我们发展具体假设来考察差序文化与省份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 Technology, PEST）四个方面共计七个操作性指标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其中，内聚机制的资源支持效应使用“民间融资”和“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考察，非正式治理效应使用“犯罪率”和“公民政治参与”考察；外斥机制的合作成本效应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产出”考察，融入成本效应使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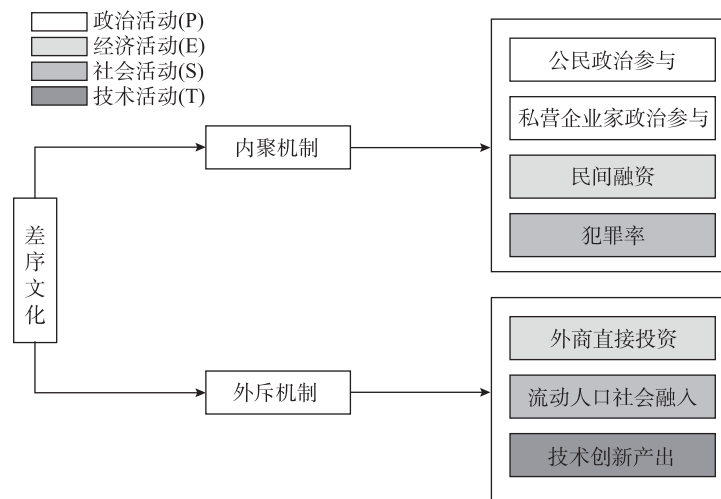


图 2 差序文化与省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关系

1. 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差序文化的内聚力部分替代了正式政治制度发挥治理功能，同时也指导着主体获取政治、经济资源时的行动逻辑。据此，本文关注差序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

关系。

第一，差序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负相关。强差序文化地区的宗亲和熟人社会内部凝聚力较强，对群体内的冲突和违规行为通常有着比正式制度更严格的规范作为治理工具（潘越等，

2019)。例如,当成员遇到困难时,其他成员往往会伸出援手;当成员犯错时,会有家法族规作为惩罚;当成员间产生纠纷时,亦是优先寻求私下解决,而非诉诸法律途径。这种由人际关系缔结的非正式治理体系部分取代了正式法律治理体系的功能,降低了地区公民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行为。Alesina 和 Giuliano (2011)提供了研究证据,他们发现个体的家庭联结越强,政治兴趣就越低,政治参与行为也越少。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2a: 在省际层面,差序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负相关。

第二,差序文化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正相关。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私营企业家通常需要与政府官员这一市场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关系,以获得政策资源来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Li et al., 2011)。然而,强差序文化社会的圈子氛围更重,官员群体可能不会轻易将私营企业家看作圈内人。面对这种排外氛围,为了获得企业所需的政策资源,当地企业家有动力开展更多政治参与,例如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任命。这增加了企业家与官员群体的身份相似性和接触机会,有助于其与官员群体建立良好关系,累积政治社会资本(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2b: 在省际层面,差序文化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正相关。

2. 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在经济投融资方面,差序文化的内聚力促进了熟人社会短半径的资源融通,而外斥力增加了主体与外部投资机构建立合作的成本。据此,本文关注差序文化与民间融资、外商直接

投资的关系。

第一,差序文化与民间融资正相关。民间融资的开展主要依赖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张博和范辰辰,2018)。强差序文化地区有利于形成更紧密的熟人社会,这提高了社会内部的信任氛围和信息交换频率,有利于快速匹配借贷双方并减少合同签订中的信息不对称,确保融资活动有效展开(Peng, 2004)。同时,熟人社会特有的声誉机制降低了借贷过程中的违约风险(潘越等,2019)。郭云南等(2013)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表明宗族网络的强度有助于提高民间融资额。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3a: 在省际层面,差序文化与民间融资正相关。

第二,差序文化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差序文化有助于促进基于本地熟人社会的短半径关系的有限信任,但对圈内利益的过度关注可能“挤出”对圈外主体的一般信任(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Bhardwaj 等(2007)发现,高于一般信任水平的社会可以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因为这类社会存在更多“自发性社交”,有利于成员之间更快建立合作关系。然而,强差序文化地区的人们更不信任外人,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多依赖熟人纽带来进行,外资机构在本地取得社会合法性的成本更高(Quer et al., 2011),因此进入当地市场的意愿和机会较低。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3b: 在省际层面,差序文化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

3. 与社会活动的关系

差序文化的内聚力有利于内群社会演化出行为规范,而外斥力则不利于新成员在心理上

融入现有群体。据此,本文关注差序文化与犯罪率、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系。

第一,差序文化与犯罪率负相关。在强差序文化社会,圈内成员具有高度的群体认同,其声誉也彼此相连,有道德污点的个体会让整个群体蒙羞,因而会遭受严厉的批判和惩罚。这种独特的声誉机制和道德约束对成员的犯罪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Sampson 等(1997)的研究间接地支持了这一点,发现强凝聚力的社区犯罪率更低,因为这些社区的居民对维持社会秩序更容易达成共识,监督和干预社会问题的意愿更高。本文推测,强差序文化下的圈内群体对个体行为存在类似于强凝聚力社区的监督和干预作用。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4a: 在省际层面,差序文化与犯罪率负相关。

第二,差序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负相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指流入者感觉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适应当地环境的程度(杨江澜等,2016)。强差序文化社会的本地圈子意识较强,对外地人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均较低(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在分配资源时存在更多偏私情况(郑伯坝,2006),研究表明,排外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流入者从当地获得社会和经济支持,导致流入者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杨菊华,2015)。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4b: 在省际层面,差序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负相关。

4. 与技术活动的关系

在技术活动方面,差序文化引发的群体圈

子分化会抑制信息、知识、资源的人际交换。本文关注差序文化与技术创新产出的关系,并认为差序文化与地区技术创新产出负相关。创新需要协同合作与知识分享。然而,强差序文化地区的人们奉行特殊主义和差别对待的行动原则,人们在创新活动中更可能偏私亲信、内外异法,阻碍群体中的协同合作与知识分享,最终导致创新产出低下。刘军等(2009)的研究证明,团队差序氛围会使圈外成员不愿意帮助圈内成员,影响团队合作。彭正龙和赵红丹(2011)发现,团队差序氛围通过抑制知识共享来降低团队创新绩效,这为差序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微观证据。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5: 在省际层面,差序文化与技术创新产出负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 省际差序文化指标的构建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 2010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CGSS 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 40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基于该调查数据产出的中英文期刊论文共计 2460 篇^①,是中国最权威、最为学界广泛采用的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李炜,2016)。

CGSS 2010 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抽

^①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数据产出的学术成果再创新高》,2019年7月8日, <http://cgss.ruc.edu.cn/index.php?r=index/artabout&aid=34>。

取样本覆盖中国 31 个省份, 100 个县级单位加五大都市, 480 个居委会, 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调查共获得 11783 个有效样本, 其中, 女性占 51.8%, 样本平均年龄 47.3 岁 ($SD=15.67$)。

2. 指标构建流程

本文使用地域文化学实证研究的层面聚合方法 (aggregation approach) (Chua et al., 2019; Gelfand et al., 2011), 首先计算出个体层面的差序格局程度 (以下简称差序程度), 并进一步将差序程度聚合到省际层面获得各省的差序文化指数。

对于差序程度的测量, 需对其理论基础做一些说明。差序格局的内涵是个体与不同类型的人际对象在交往行为上的差序性 (费孝通, 2008), 因此, 有效的测量要考虑三个问题: ①不同人际对象依据何种标准划分? ②广泛的人际交往行为使用何种变量来捕捉? ③差序性通过什么技术计算? 对此, Hu (2017) 和胡安宁 (2018) 开发了一种巧妙的测量方法, 即使用信任来代理广泛的人际交往行为, 进而通过个体对不同人际对象的信任差序来测度其差序程度, 而信任差序则是通过回归斜率法 (regression slope measurement) 来实现。信任源于关系双方的亲近和熟悉, 反映了一段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 同时又是承载众多人际活动的基础, 很多常规的人际行为 (例如合作行为) 都建立在双方的信任之上 (Granovetter, 1985)。因此, 信任差序正是差序格局在社会现实中的典型体现 (高承恕和陈介玄, 1989; 郑伯坝, 2006)。

Hu (2017) 和胡安宁 (2018) 的思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②和问题③, 但是针对问题①,

他们只是将人际对象粗略划分为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四类, 这种划分缺乏理论依据和区分度 (例如, 亲戚、朋友和同事都隶属于熟人范畴), 也遗漏了陌生人等重要的对象。因此, 本文依据现有中国人际对象划分的代表性文献 (Tsui & Farh, 1997; Yang, 1995; 黄光国, 1985; 罗家德, 2012), 将中国人的人际对象按照由亲到疏的顺序划分为家人、亲友、相识和生人四类, 个体与四类对象关系的情感成分依次降低, 工具成分依次升高 (黄光国, 1985), 同时个体在与它们交往的过程中遵循着不同的人际法则 (Tsui & Farh, 1997; Yang, 1995; 罗家德, 2012)。这是本文对原方法局限的弥补。

为确保测量的内容效度, 我们遵循学者的建议 (Hinkin & Tracey, 1999), 邀请了 12 名管理学系的博士生作为评审专家, 在 Likert 五点量表上评估测量工具与“差序程度”定义的匹配程度 (1 = “非常不符合”, 5 = “非常符合”)。12 名专家对于内容效度评价的总平均分为 4.57 分 ($SD=0.52$), 说明差序程度测量的内容效度良好。

省际差序文化指数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 个体对不同对象信任水平的测量及信效度验证。

CGSS 2010 使用 Likert 五点量表询问了受访者对不同人际对象的信任水平 (“对于下面几类人, 您的信任度怎么样?”: 1 = “完全不信任”, 5 = “完全信任”), 本文选取七类对象, 将它们归入“家人”、“亲友”、“相识”和“生人”四类前述的范畴中。具体地, 对家人的信任使用“对自己家里人的信任”衡量; 对亲友的信

任使用“对亲戚的信任”和“对朋友的信任”的均值衡量；对相识的信任使用“对老乡的信任”和“对同学的信任”的均值衡量；对生人的信任使用“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和“对生意人的信任”的均值衡量^①，个体与这两类社会群体的关系模式符合生人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的本质特征，即不同于家人、亲友和相识关系具有情感性成分，生人关系的情感性成分甚微，更接近于工具性交换关系（Yang, 1995；黄光国, 1985；郑伯坝, 2006）。对于缺失数据，使用序列均值替代。

进一步地，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在信度方面，“对亲友的信任”“对相识

的信任”的 α 系数分别为0.72、0.71，均高于推荐值0.70，说明信度良好；“对生人的信任”的 α 系数为0.58，虽然低于0.70，但参考以往研究，两题项量表的 α 系数为0.58是可接受的（Eisinga et al., 2013；Hinton, 2004；Willis et al., 2017）^②。在效度方面，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和最大方差法（varimax method），根据理论结构固定抽取四个因子。结果如表1所示，探索性因子分析都获得了具有清晰结构的因子构成，因子构成与理论对关系圈层的划分相一致，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1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旋转成分矩阵

关系类型	题项	因子载荷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对家人的信任	对自己家里人的信任	0.076	0.166	0.034	0.970
对亲友的信任	对亲戚的信任	0.114	0.840	0.107	0.281
	对朋友的信任	0.302	0.817	0.197	-0.021
对相识的信任	对同学的信任	0.865	0.201	0.127	0.059
	对老乡的信任	0.805	0.175	0.274	0.055
对生人的信任	对生意人的信任	0.138	0.092	0.853	-0.033
	对领导干部的信任	0.225	0.179	0.753	0.094

注：KMO值为0.7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 $p < 0.001$ ），四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9.46%；黑体加粗的数字为各因子之下高于0.60的因子载荷。

个体对四类人际对象信任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个体对于家人、亲友、相识、生人的信任水平的均值单调递减，标准差单调递增，这都符合理论预期，说明四

类对象确实依次对应了以己为中心由内到外的四种关系圈层。因此，本文对于四类人际对象的分类具有可靠的理论效度。

① 为检验这一测量的效度，我们在省份层面计算了这一测量的结果指标与2008年、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中“对生人的信任”之间的相关性。Bootstrap法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个指标之间显著正相关（ $r = 0.38$, 95% CI = [0.04, 0.53], $N = 28$ ），说明这一测量的效度良好。

②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所用量表的信度，参考部分学者的建议（Eisinga et al., 2013；Neys et al., 2014；Verhoef, 2003），我们进一步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Brown系数检验两题项量表的信度。本文三个量表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54、0.56、0.40（所有 $p < 0.001$ ），呈现出中等程度的正相关（Neys et al., 2014），说明量表信度良好；三个量表的Spearman-Brown系数分别为0.70、0.71、0.58，高于可接受标准0.50（Eisinga et al., 2013；Hinton, 2004；Napoli et al., 2014），说明量表信度良好。

表2 对四类人际对象信任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测量题项	均值	
对家人的信任	对自己家里人的信任	4.81 (0.47)	4.81 (0.47)
对亲友的信任	对亲戚的信任	4.21 (0.74)	4.02 (0.67)
	对朋友的信任	3.84 (0.79)	
对相识的信任	对同学的信任	3.59 (0.75)	3.53 (0.69)
	对老乡的信任	3.48 (0.82)	
对生人的信任	对生意人的信任	3.27 (0.98)	2.93 (0.81)
	对领导干部的信任	2.59 (0.95)	

注：括号内为变量的标准差。

(2) 个体差序程度的计算。

根据 Hu (2017) 和胡安宁 (2018) 提出的回归斜率法,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rdinary linear squares, OLS) 拟合线性回归模型 (1)。

$$Trust = \alpha + \beta \times Referent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自变量 *Referent* 表示不同关系圈层的对象, 按照家人 = 1、亲友 = 2、相识 = 3、生人 = 4 进行编码; 因变量 *Trust* 表示个体对不同人际对象的信任水平; α 是截距项, ε 是随机扰动项。通过拟合模型 (1), 可以估计出斜率系数 β , 其含义是个体对某一对象的特定信任水平随着关系圈层的外推而变化的速率。变化越快, 说明个体对关系亲疏远近的区分越明显, 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差序性就越强 (胡安宁, 2018)。由于 β 为负数, 考虑到直观性, 将 β 的相反数作为个体差序程度的得分。 β 的相反数越大, 个体的差序程度越高。

(3) 数据聚合与各省差序文化得分。

在数据聚合之前, 需要计算 $r_{wg(j)}$ 、组内相关系数 (ICC [1]) 和评判间信度 (ICC [2]) 来衡量差序程度得分的一致性, 以判断是否适合将个体层面的得分聚合为省际层面的得分 (Bliese, 1998)。统计结果显示, 同省份个体的差序程度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F_{(30, 2681.95)} = 14.32, p < 0.001; r_{wg(j)} = 0.71, ICC [1] = 0.04, ICC [2] = 0.93$), 表明差序格局确实是一个存在于省份层面的文化现象, 同一省内的个体共享相同的差序文化, 而省份之间的差序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别。因此,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省际差序文化可以通过数据聚合来计算。

在通过层面聚合计算出各省差序文化得分后, 为了便于解释, 本文参考 Chua 等 (2019) 的做法, 对各省差序文化的原始得分进行极差标准化后再加上 2, 作为差序文化的最终得分。31 个省份差序文化的均值为 2.47, 标准差为 0.19。具体得分及排序如表 3 所示。

表3 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差序文化得分及排序

省份	差序文化得分	排序 (由高到低)
青海省	3.000	1
内蒙古自治区	2.703	2
天津市	2.694	3
黑龙江省	2.654	4
安徽省	2.646	5
上海市	2.627	6
西藏自治区	2.621	7
江苏省	2.567	8
陕西省	2.559	9
河北省	2.541	10
福建省	2.525	11

续表

省份	差序文化得分	排序 (由高到低)
贵州省	2.515	12
北京市	2.497	13
浙江省	2.496	14
河南省	2.490	15
湖南省	2.473	16
山东省	2.461	17
甘肃省	2.459	18
吉林省	2.454	19
江西省	2.452	20
湖北省	2.434	21
广东省	2.414	22
山西省	2.350	23
宁夏回族自治区	2.345	24
重庆市	2.329	25
四川省	2.299	26
辽宁省	2.283	27
云南省	2.261	28
广西壮族自治区	2.229	29
海南省	2.135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31

注：港、澳、台地区由于缺少数据，没有标明具体得分。

(4) 差序文化指标的效度验证。

本文选择“等级观念”作为关联效标，以检验差序文化的效度。阎云翔（2006）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差序格局的概念也蕴含着等级观念，体现了社会尊卑上下的权力等级秩序。因此，如果差序文化与等级观念正相关，则说明我们的指标确实反映了差序文化的内涵。此处，我们使用权力距离（即，“一个地区的机构和组织中，成员对于权力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Hofstede et al., 2010: 60）作为等级观念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赵向阳等（2015）的研究。统计结果显示，差序文化与权力距离显著正相关（ $r = 0.33, p =$

$0.074, N = 31$ ），表明本文的差序文化指标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二) 省际宏观指标的测量

因变量的测量均采用主流测量方法，并尽可能选择多种来源的数据库，以增强结果的说服力。

(1) 公民政治参与：借鉴孙三百（2018）的研究，使用“是否在上次居（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投过票”来衡量公民政治参与，投过票编码为1，反之编码为0。随后，将变量聚合到省际层面来衡量各省公民政治参与程度。数据来源于2010~2015年的CGSS。

(2) 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借鉴Li和Li-ang（2015）的做法，通过政治任命来衡量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情况。具体地，我们首先从2010年、2012年、2014年的中国私营企业家调查中获得私营企业家个体的政治任命数据，如果被调查的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被视为具有政治任命。进一步地，计算“各省份具有政治任命企业家占受调查企业家总数的比例”，以此衡量各省份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总体情况。

(3) 民间融资：使用王小鲁等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7年报告》中2010年、2012年和2016年的“民间融资环境指数”来衡量。

(4) 外商直接投资：借鉴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的研究，使用“省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5) 犯罪率：借鉴章元等（2011）的研究，使用各省份“每万人刑事逮捕的人数”来衡量，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的《中国检察年鉴》。

(6)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借鉴杨江澜等

(2016)的研究,使用2011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关注现在居住的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四题的均值计算个体流动人员的社会融入,再将其聚合到省份层面衡量各省份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7) 技术创新产出:借鉴Chua等(2019)的研究,使用“每位科学家专利授权总数”即专利授权总数与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比值来衡量省份创新产出。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8) 控制变量:我们遵循国际顶级期刊上

地域文化指标开发的研究思路(Gelfand et al., 2011),对每个模型使用相同的控制变量,以确保假设检验的结果建立在同一标准之上。首先,因为上述因变量大多与省份经济状况有关,我们控制省份人均GDP。其次,鉴于自变量“差序文化”是通过个体对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的“斜率”来测量的,因此也控制对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的“平均水平”,其内涵是一省份内人们的“信任倾向”(胡安宁,2019)。最后,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以上变量中,“犯罪率”“技术创新产出”“人均GDP”均存在明显的右偏分布,故在回归之前对其取自然对数。变量测量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量方法
因变量	公民政治参与	各省份公民在上次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的比例(%)
	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	各省份获得政治任命的私营企业家的比例(%)
	民间融资	各省份民间融资环境指数
	外商直接投资	各省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例(%)
	犯罪率	各省份每万人刑事犯罪逮捕的人数(人)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各省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数的平均值
	技术创新产出	每位科学家专利授权总数(项)
自变量	差序文化	根据上文指标构建方法计算
控制变量	人均GDP	平均每人GDP(万元)
	信任倾向	对四类对象信任的平均值的省际层面聚合值
	年份固定效应	各年份的虚拟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 差序文化省际异质性分布的存在性及成因检验

1. 差序文化省际异质性分布的存在性检验
假设1提出差序文化在各省份之间存在异质

性分布。本文参考地域文化学的主流方法(Chua et al., 2019; Gelfand et al., 2011;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来检验这一假设。首先, Welch方差分析(Levene's test, $F_{(30,11752)} = 4.62, p < 0.001$)结果显著($F_{(30,2681.96)} = 14.32, p < 0.001$);同时,如前文所述, $r_{wg(j)}$ 、ICC [1]和ICC [2]三个层面聚合指标皆高于推荐值,

说明中国各省份的差序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假设 1 得到支持。

中国省际差序文化的分布呈现出“局部趋同,整体趋异”的特点,可谓“共相与殊相并存”。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诸多省份的差序文化呈现出地域性聚集的特征,其差序文化得分大多介于 2.4~2.6,说明这些省份的差序文化趋于一致。Games-Howell 事后多重比较 (post hoc tests) 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两两之间的差序文化并没有显著差异 (所有 $p>0.1$)。这些省份处于或毗邻中原,不仅农耕传统悠久,而且绝大多数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汉民族儒家政权的统治,其历史沿袭和民族构成大致相同 (鲁西奇, 2014), 因此差序文化系出同源,并无殊异。尽管如此,差序文化在中国各省份间整体上呈现出异质性分布特征。一个显著的地域变异是西南和华南诸省的差序文化明显低于中原诸省。例如,四川、重庆、云南、广东、广西、海南的差序文化显著低于天津、河北、河南、陕西等省份 (所有 $p<0.05$), 这反映了儒家伦理影响程度的省际差异,因为相比中原诸省,西南和华南省份在历史上长期处在儒家政权的边陲地带。最后,差序文化在一些地域内部也存在局部性变异。例如,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东北地区省份的差序文化存在显著差异 (所有 $p<0.05$), 西藏和青海的差序文化显

著高于邻近的四川和新疆 (所有 $p<0.001$)。总体而言,以上结果均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1。

2. 补充性分析: 检验农耕经济、儒家文化对差序文化的塑造作用

根据前文所述,差序文化起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各省份在农耕经济、儒家文化上的长期异质性是塑造差序文化省际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均应该与差序文化正相关。对此,我们进行了实证检验。

在变量测量和数据来源方面,对于农耕经济,我们参考 Talhelm 等 (2014) 的方法,使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99 年“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耕地面积 (取自然对数)”的平均值来衡量各省份对农耕经济的依赖程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对于儒家文化,我们使用明清时期 (1371~1905 年) 各省份的进士密度 (即每百万人口中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进士学位的人数,取自然对数) 来衡量,许多研究使用这一指标来测度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 (Chen et al., 2020; Ji et al., 2021; 陈刚和邱丹琪, 2021; 李飞跃等, 2014; 林建浩等, 2018)。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差序格局”是立足于中国汉民族社会的文化和历史被提出,我们将分析样本限定在汉民族文化圈的 27 个省份以内^①。最终,差序文化对农耕经济的回归共包含 27 个省份,由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份缺少儒家文化数据,差序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回归共

^① 根据现有研究的考证 (范勇, 2010; 苏秉琦, 2011; 许倬云, 2011), 传统上汉民族聚落的地区覆盖了六个亚文化圈——黄土高原文化圈 (陕西、山西、甘肃和宁夏)、华北平原文化圈 (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和天津)、东北森林与农耕文化圈 (黑龙江、吉林和辽宁)、长江上游山地文化圈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广西)、长江中下游平原文化圈 (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和江西) 和南部低山丘陵地区文化圈 (福建、广东和海南), 共计包括 27 个省级行政区。青海、西藏、新疆和内蒙古 4 个省份则并不在传统的汉民族文化圈以内。

包含 25 个省份。

表 5 报告了差序文化对农耕经济、儒家文化的回归结果。模型 1 的结果表明，农耕经济与差序文化显著正相关 ($b = 0.17$, $se = 0.08$, $p < 0.05$)；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与差序文化显著正相关 ($b = 0.15$, $se = 0.05$, $p < 0.01$)。这些结果均与理论预测相一致。此外，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包括使用不同时间窗口的数据来测量农耕经济，以及使用“举人密度”“生员密度”来测量儒家文化，研究结果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确实是塑造差序文化省际异质性的的重要因素，也说明本文的差序文化指标具有良

好的效标关联效度（见图 3 和图 4）。

表 5 农耕经济、儒家文化、气候适宜度与差序文化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农耕经济	0.17* (0.08)		
儒家文化		0.15** (0.05)	
气候适宜度			-0.08+ (0.05)
N	27	25	31
R ²	0.13	0.35	0.10
Adj_R ²	0.10	0.32	0.07
F	3.81	12.46	3.35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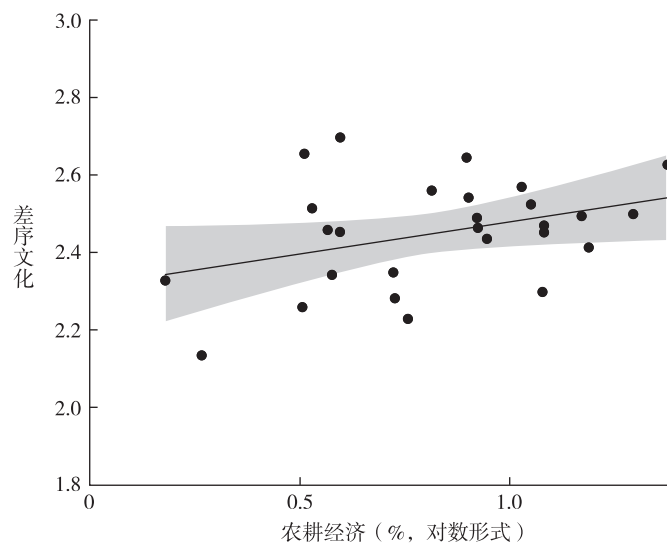


图 3 农耕经济与差序文化的关系

3. 补充性分析：对“气候影响文化假说”的探索性分析

为了对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 31 个省份的差序文化得分和排序情况提供一个整体性解释，我们引入“气候影响文化假说”，这一

假设已受到大量证据支持（Van de Vliert et al., 2013）。具体而言，地区的气候适宜度通过塑造当地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人际行为来塑造差序文化（Oishi, 2014）。人类是温血动物，对环境的温度有所要求（Van de Vliert et al.,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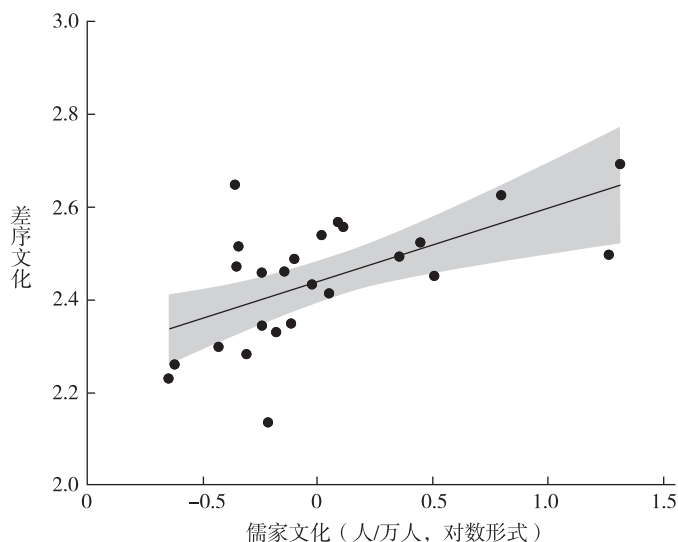


图4 儒家文化与差序文化的关系

Wei 等 (2017) 的研究显示, 温和的温度会鼓励人们外出探索、从事大量社交并与陌生人接触, 而严寒或酷热的环境会降低人们户外活动和人际交往的意愿, 促使其长时间待在居所中, 这使得气候适宜地区的人们更加外向和开放。据此推测, 在气候适宜的省份, 人们外出的次数更多, 与家族和熟人之外的生人开展社交的机会和时间也更多, 社交时间的均衡分配弱化了人们与不同对象间的亲疏差异, 差序文化更弱; 相反, 在气候严酷的省份, 人们更多待在居所当中与家族成员开展接触, 而很少与外人往来, 使亲疏关系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 差序文化更强。

我们参考 Wei 等 (2017) 的做法, 使用“2000~2010 年各省份年平均气温接近适宜气温 (即 22℃) 的程度 (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各省份气候适宜度, 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表 5 还报告了差序文化对各省气候适

宜度的回归结果。模型 3 的结果显示, 气候适宜度与差序文化边际显著负相关 ($b = -0.08$, $se = 0.05$, $p < 0.1$), 这与理论预测相一致 (见图 5)。因此, 气候适宜度为中国 31 个省份的差序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解释^①。

4. 小结

上述结果表明, 差序文化在中国存在显著的省际异质性分布。各省份差序文化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 一些省份 (例如, 青海、西藏、天津、安徽、上海) 的差序文化得分虽然相近, 但是塑造其差序文化的具体前因有所不同。具体地, 汉民族聚落省份 (例如, 天津、安徽、上海) 的差序文化由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来解释, 这支持了本文有关差序文化地区异质性形成的理论。相比之下, 青海、西藏等非汉民族聚落省份的差序文化主要由气候适宜度这一普适的、不具有历史

^① 将三个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时, 儒家文化 ($b = -0.11$, $se = 0.05$, $p < 0.05$)、气候适宜度 ($b = -0.64$, $se = 0.03$, $p < 0.1$) 与差序文化的关系均保持稳健。农耕经济与差序文化依然保持正相关关系但并未达到显著 ($b = 0.11$, $se = 0.08$, $p = 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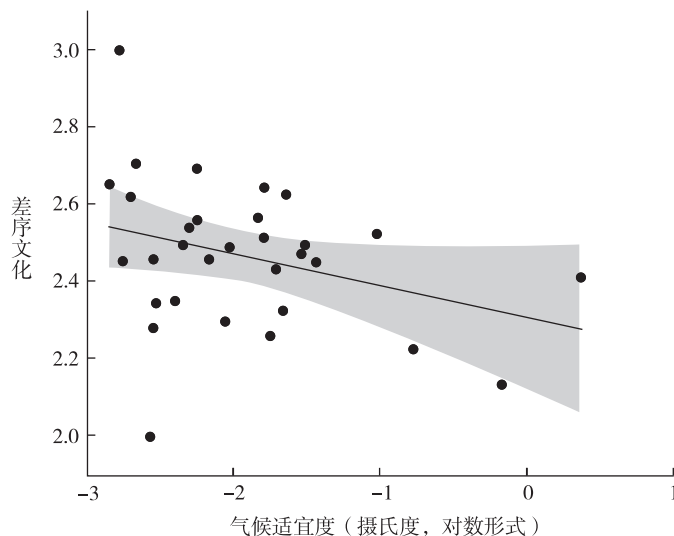


图5 气候适宜度与差序文化的关系

或文化特异性的因素来解释，这为本文的理论提供了有益补充。

(二) 差序文化对省份发展的预测有效性检验

假设2至假设5是关于差序文化与省份发展的相关关系。由于差序文化和信任倾向是省级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本文使用混合回归 (pooled regression model) 来检验这些假设。经过Pesaran检验、Wooldridge检验和Modified Wald检验，绝大部分模型存在截面相关、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此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进行估计 (Driscoll & Kraay, 1998)。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因变量的时间序列长度不同以及缺

失值的存在，各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包含的样本量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回归分析中的样本量均为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大样本量。

1. 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表6报告了差序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回归结果。模型2的结果表明，差序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显著负相关 ($b = -0.18$, $se = 0.06$, $p < 0.05$)，这一关系由图6直观展现，假设2a得到支持。模型4的结果表明，差序文化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存在显著正相关 ($b = 0.22$, $se = 0.06$, $p < 0.10$)，这一关系由图6直观展现，假设2b得到支持。

表6 差序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回归分析

变量	Y: 公民政治参与		Y: 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差序文化	-0.17* (0.05)	-0.18* (0.06)	0.11* (0.07)	0.22+ (0.06)

续表

变量	Y: 公民政治参与		Y: 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人均 GDP		0.00 (0.02)		-0.05* (0.00)
信任倾向		-0.01* (0.03)		0.20* (0.0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2	142	93	93
R ²	0.05	0.05	0.06	0.10
F	14.38	9.81	8.10	11.97

注: + $p < 0.10$, * $p < 0.05$; 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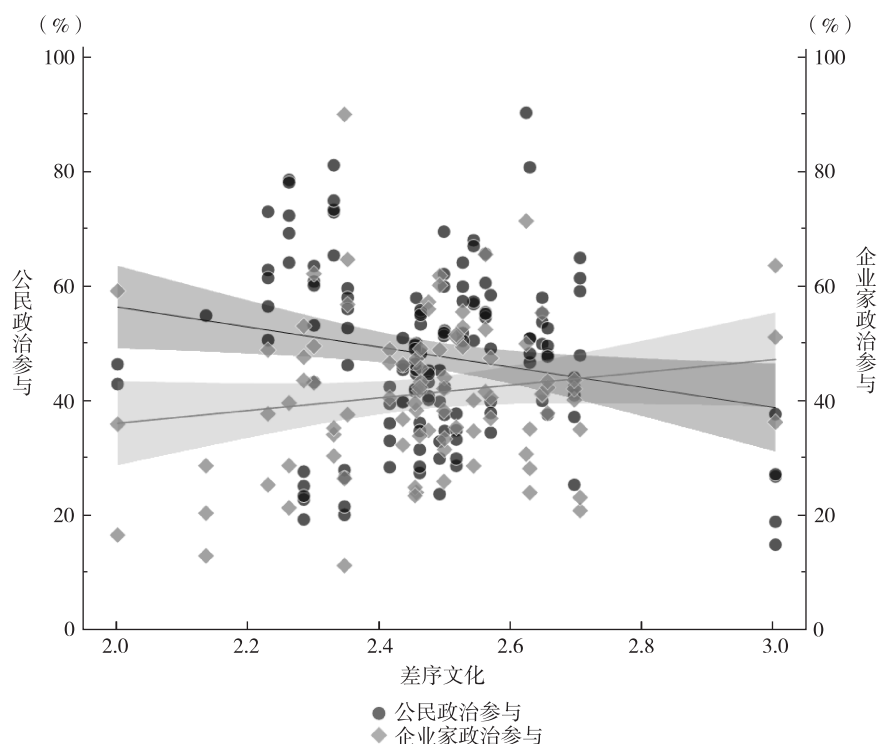


图 6 差序文化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2. 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表 7 报告了差序文化与民间融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结果。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差序文化与民间融资相关性在系数上与理论预期一致但不显著 ($b = -0.16$, $se = 0.10$, $n.s.$)，假设 3a 未得到支持。模型 4 的结果表明，差序文

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负相关 ($b = -1.98$, $se = 0.38$, $p < 0.001$)，假设 3b 得到支持。图 7 可直观展现差序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3. 与社会活动的关系

表 8 报告了差序文化与犯罪率、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回归结果。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差

序文化与犯罪率显著负相关 ($b = -0.95$, $se = 0.04$, $p < 0.001$), 这一关系由图 8 直观展现, 假设 4a 得到支持。模型 4 的结果表明, 差序文

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显著负相关 ($b = -0.16$, $se = 0.04$, $p < 0.05$), 这一关系由图 8 直观展现, 假设 4b 得到支持。

表 7 差序文化与民间融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分析

变量	Y: 民间融资		Y: 外商直接投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差序文化	0.37* (0.08)	0.16 (0.10)	0.20 (0.47)	-1.98*** (0.38)
人均 GDP		0.12 (0.04)		2.42*** (0.19)
信任倾向		-0.17 (0.08)		-2.05* (0.6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7	87	225	225
R ²	0.48	0.51	0.01	0.35
F	21.38	2.87	0.18	239.51

注: * $p < 0.05$, *** $p < 0.001$; 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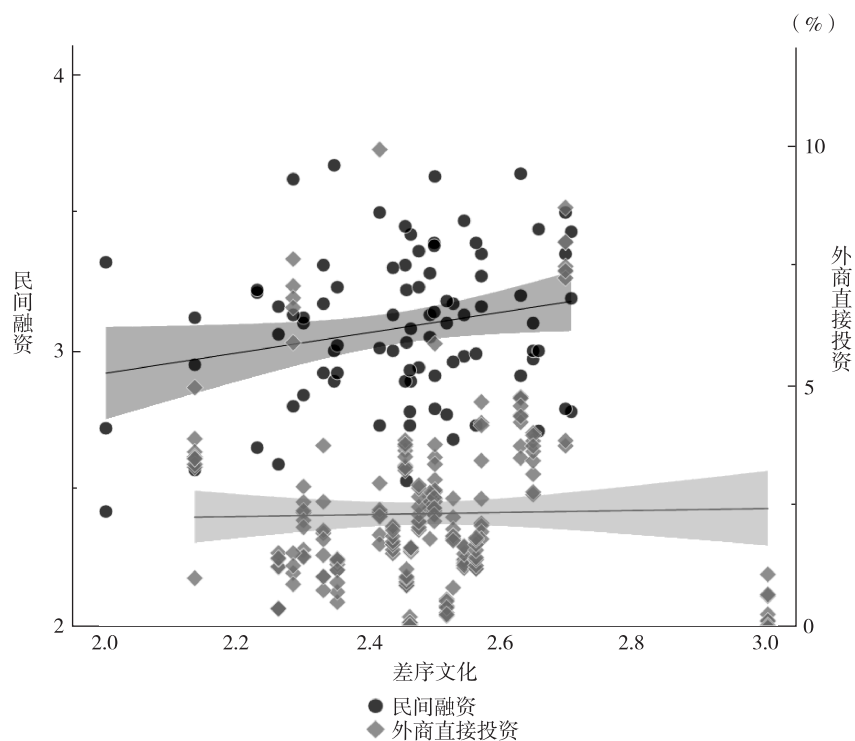


图 7 差序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表 8 差序文化与犯罪率、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回归分析

变量	Y: 犯罪率		Y: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差序文化	-0.35** (0.07)	-0.95*** (0.04)	-0.15* (0.03)	-0.16* (0.04)
人均 GDP		0.30*** (0.03)		0.02 (0.01)
信任倾向		-1.04** (0.25)		0.01 (0.03)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23	223	93	93
R ²	0.06	0.25	0.07	0.08
F	23.01	580.28	28.74	181.89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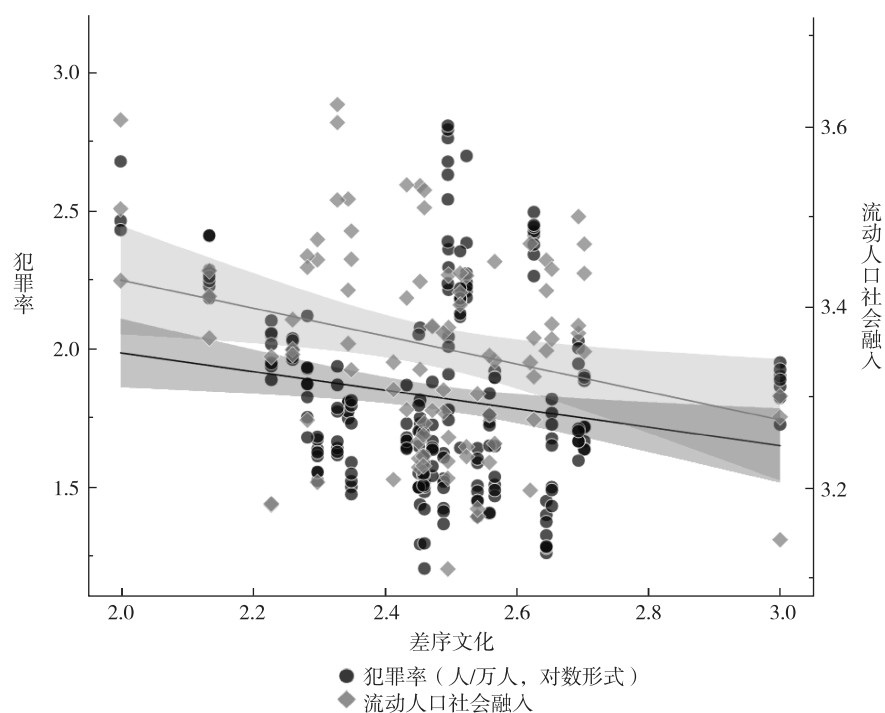


图 8 差序文化与社会活动的关系

4. 与技术活动的关系

表 9 报告了差序文化与技术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差序文化与每位科学家专利授权总数显著负相关 ($b = -1.04$, $se = 0.16$, $p < 0.001$)，这一关系由图 9 直观展现，假设 5 得到支持。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

将因变量替换成“每位科学家发明新型专利授权数”和“每位科学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进行检验，它们分别衡量了省份的变革式创新产出和渐进式创新产出 (Chua et al., 2019)。模型 4 和模型 6 的结果表明，差序文化与每位科学家发明新型专利授权数 ($b = -1.09$, $se =$

0.11, $p < 0.001$) 和每位科学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 ($b = -0.99$, $se = 0.22$, $p < 0.001$) 均显著负相关, 这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5。最后, 模型 8

的结果显示, 差序文化与每位科学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显著负相关 ($b = -1.34$, $se = 0.18$, $p < 0.001$), 假设 5 再次得到支持。

表 9 差序文化与技术创新产出的回归分析

变量	Y: 每位科学家专利授权总数		Y: 每位科学家发明专利授权数		Y: 每位科学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		Y: 每位科学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差序文化	-0.34*** (0.06)	-1.04*** (0.16)	-0.41*** (0.05)	-1.09*** (0.11)	-0.49** (0.10)	-0.99** (0.22)	-0.08 (0.21)	-1.34*** (0.18)
人均 GDP		0.29* (0.08)		0.32*** (0.05)		0.30* (0.10)		0.13 (0.10)
信任倾向		-1.30*** (0.22)		-1.20*** (0.20)		-0.81** (0.20)		-2.84*** (0.3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R ²	0.30	0.41	0.49	0.59	0.37	0.44	0.04	0.16
F	35.96	16.89	61.46	55.81	23.29	31.24	0.14	28.63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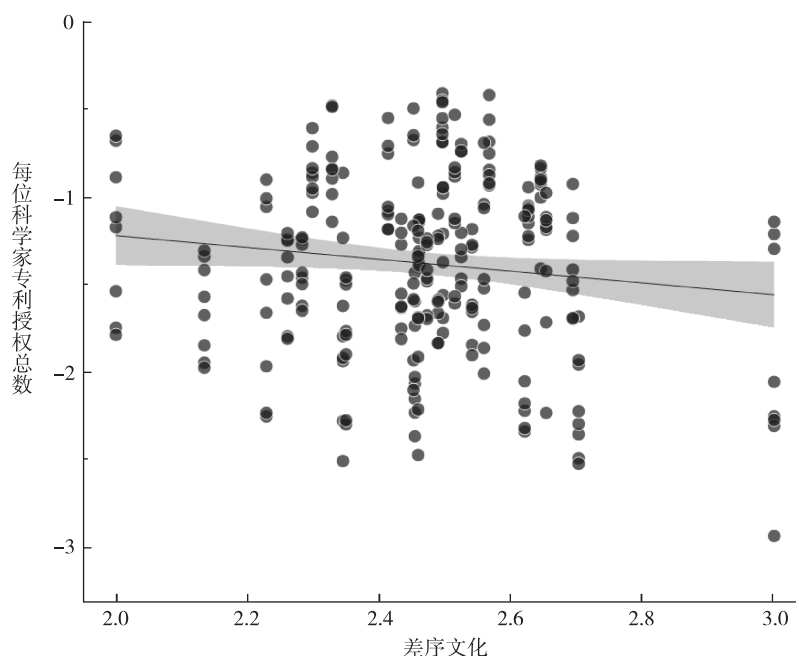


图 9 差序文化与技术活动的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发现

本文是极少数将差序格局纳入实证分析的研究,通过引入地域文化学的理论视角和实证进路,拓展了“差序格局”这一极具本土典型性、深层次概念的文化分析范式。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差序文化在中国各省份之间存在异质性分布,具体呈现为“局部趋同,整体趋异”的结构特征,这种异质性分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等有关。第二,差序文化的省际异质性对当代省份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它广泛解释了各省份在公民政治参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外商直接投资、犯罪率、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上的差异。

(二) 理论贡献

本文对于差序格局文献具有三方面重要理论意义。第一,率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支持了差序文化省际异质性分布的存在性,不仅促进厘清了差序格局理论的边界,也深化了对于差序格局现象形成原因的理解。省际异质性的存在挑战了以往研究关于“差序格局在中国内部具有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勾勒出差序格局理论的边界条件,表明地区分布是今后社会科学(例如管理学)研究在应用差序格局时需要关注的因素(胡安宁,2020)。例如,研究者应当注意到,一些地区(例如川渝)的差序文化偏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管理现象(例如家族企业治理)可能并非由差序格局引起的。相反,这些地区更适合与强差序文化

地区建立对照,用于比较分析差序格局理论本身。进一步地,农耕经济、儒家文化与差序文化呈现正相关关系。这率先在实证上支持了差序格局起源的学界主流观点,即差序格局的存续是以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和伦理本位的儒家精神为土壤(费孝通,2008;阎明,2016;阎云翔,2006;翟学伟,2009;周飞舟,2015)。这一发现亦有助于理解本土情境下差序格局现象的深层次根源,表明特定类型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安排可能是塑造社会或组织中差序格局现象的重要力量。最后,除汉族省份外,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省份也呈现出强差序文化,分析显示这与当地严酷的气候条件有关。这支持了一个新近观点,即差序格局并非汉族传统社会独有的文化特征,而是一种普适的文化维度,其他社会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同样会呈现出差序格局(Hu,2017;胡安宁,2020;阎明,2016),差序格局的理论应用可能不局限于汉族传统社会的组织情境中。

第二,为未来社会科学研究考察和应用差序格局理论提供了实证工具。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证伪。尽管差序格局理论很早就被应用于回答中国情境下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如中国家族企业治理(Peng,2004;祝振铎等,2018),但是限于缺少文化层面的测量技术,这一理论始终难以得到实证检验。本文开发的经验工具有助于突破这一局限,其优势在于计算方便,并且利用的题项在大部分社会调查中可以获得,研究者可借此构建企业、省份乃至跨国的文化指标,并将其与同层面或更低层面的其他变量相结合,开展主题广泛的实证研究(胡安宁,

2018)。

第三,揭示了差序文化与省份发展之间的广泛而辩证的内在联系。本文发现,差序文化的省际异质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它为中国省际层面诸多看似不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现象提供了简洁的解释。进一步地,差序文化与省份发展的关系又是辩证的,蕴含了“内聚”与“外斥”两种机制。这为一些华人组织行为研究(刘军等,2009;郑伯坝,2006)提供了宏观证据支持,表明差序格局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圈内治理效率的同时,也会造成对圈外人治理的效率损失。

(三) 实践启示

本文对于政策制定、企业经营和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首先,鉴于各省份差序文化具有较大差异及其与省份发展的广泛而辩证的联系,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例如,外商或人才引进政策)时应当因地制宜,考虑当地社会的差序文化对政策实施的影响,并思考如何在差序文化的利弊之间取得最优平衡。其次,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跨省经营(例如,选择进入异地新市场的战略方案、派遣母公司经理到异地子公司任职)时应当重视这种人际关系文化的差异,以提高成功的概率。最后,文化工作者向社会介绍差序格局时应当全面、辩证,既肯定其作为传统文化的存在合理性,也承认其在促进现代社会长半径合作方面的不足,以帮助民众形成正确认识。

(四) 本文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率先对验证差序文化的国家内变异及

其影响做出了探索性工作,但是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第一,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限制,本文仅探讨了省际层面差序文化的异质性。文化的地区变异可能存在于各省份内部,例如城市或社区之间(Talhelm & Oishi, 2018),未来研究可以开发市级或县级层面的差序文化指标。第二,本文主要从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两类长期稳定的因素来探讨差序文化。实际上,地区历史上短期的社会剧变和伴随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会对当地文化产生冲击(Schulz et al., 2019),未来研究可以探索这些因素如何塑造差序文化的地区差异^①。第三,本文的指标是静态的,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构造指标的时间序列,以探索差序文化的动态变迁(Tung, 2008)。第四,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关注的是“差序文化”这一概念的解释能力,因此主要验证了差序文化与地区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这种做法与文化指标开发的主流研究相一致(Gelfand et al., 2011;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可以借助更稳健的推断方法,分析差序文化与地区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以验证和发展现有学术观点。总的来说,“差序文化的地区异质性分布”是一个兼具主题广度、理论深度和本土特色的研究领域,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五) 结论

学界长期以来将差序格局视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特征,假设它在中国各地区具有同质性。本文在构建省际差序文化测量方法的基础上,

^① 遵循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我们补充检验了“抗日战争”历史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省人口流动对差序文化的影响,尽管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是系数的符号与理论预测一致(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笔者索取)。

对这一主流假设提出挑战。基于地域文化学进路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均表明,差序文化在中国内部存在显著的省际异质性,并且这种异质性是很重要的,它能够广泛解释省际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说明省际分布是今后相关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本文为“差序格局”概念的拓展和运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工具,对于推动面向实证的差序格局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接受编辑:贾良定

收稿日期:2021年5月26日

接受日期:2022年1月5日

作者简介:

赵璞初,现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包括行为伦理、跨文化管理和人工智能。发表文章见于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等期刊。

秦昕(通讯作者, E-mail: qinxin@sysu.edu.cn),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哈佛大学商学院中美富布赖特(Fulbright)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兴趣包括领导、伦理、交叉学科研究等,正着力开展系列前沿交叉学科研究。发表文章见于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British Medical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和《管理世界》《心理学报》等期刊。

陈晨,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非)伦理行为、领导力、人工智能与伦理等。发表文章见于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和《管理世界》《心理学报》等期刊。

李琬璐,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博士后。在香港教育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主动性行为、隐私、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应用等。已在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等国际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关键,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包括伦理、跨文化和人工智能交叉学科研究。发表文章见于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等期刊。

甘雨青,现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兴趣包括领导、伦理和人工智能交叉学科研究。

参考文献

- [1]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 [2] 陈斌开、陈思宇:《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 [3] 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 [4] 陈刚、邱丹琪:《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一项流行病学研究》,《财经研究》,2021年第3期。
- [5]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

2期。

[6] 范勇:《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7]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 冯晨、陈舒、白彩全:《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根源:制度差异、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9] 高承恕、陈介玄:《台湾企业运作的社会秩序:人情关系与法律》,《社会与经济》,1989年第3期。

[10] 郭云南、张琳弋、姚洋:《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金融研究》,2013年第9期。

[11]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2] 胡安宁:《差序格局:“差”、“序”几何?——针对差序格局经验测量的一项探索性研究》,《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3] 胡安宁:《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社会》,2019年第3期。

[14] 胡安宁:《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传承:实践—认知图式导向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15]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李亦园、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版。

[16] 李飞跃、张冬、刘明兴:《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17] 李炜:《与时俱进: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调查研究的发展》,《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9] 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 林建浩、辛自强、范佳琳、周先波:《中国省际双边信任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7期。

[21] 刘春、李善民、孙亮:《独立董事具有咨询功能吗?——异地独董在异地并购中功能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

[22] 刘军、章凯、仲理峰:《工作团队差序氛围的形成与影响:基于追踪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8期。

[23] 刘瑞明、赵仁杰:《国家高新区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管理世界》,2015年第8期。

[24]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5] 罗党论、唐清泉:《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09年第7期。

[26] 罗家德:《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27] 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8] 潘越、宁博、纪翔阁、戴亦一:《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29] 彭正龙、赵红丹:《团队差序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知识转移的视角》,《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8期。

[30] 秦鹏飞:《儒家思想中的“关系”逻辑——“伦”字界说及其内在理路》,《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31] 阮建青、王凌、李垚:《创新差异的基因解释》,《管理世界》,2016年第6期。

- [3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 [33]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5 期。
- [34] 孙三百:《住房产权、公共服务与公众参与——基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视角的比较研究》,《经济研究》,2018 年第 7 期。
- [35] 童泽林、黄静、张欣瑞、朱丽娅、周南:《企业家公德和私德行为的消费者反应: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管理世界》,2015 年第 4 期。
- [36] 王明琳、徐萌娜、王河森:《利他行为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吗?——基于家族企业中亲缘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4 年第 3 期。
- [37] 王小鲁、樊纲、马光荣:《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2017 年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 [38] 吴超鹏、薛南枝、张琦、吴世农:《家族主义文化、“去家族化”治理改革与公司绩效》,《经济研究》,2019 年第 2 期。
- [39] 肖瑛:《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 6 期。
- [40]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 [41] 薛亦伦、张骁、丁雪、沙开庆:《高政治技能的员工如何规避工作场所排斥?——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研究》,《管理世界》,2016 年第 7 期。
- [42]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 [43] 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 [44] 杨江澜、王洁、薛海娇、李华:《流动人口城镇社会融入信心指数编制及应用》,《人口研究》,2016 年第 5 期。
- [45]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 [46] 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 [47] 张博、范辰辰:《文化多样性与民间金融:基于方言视角的经验研究》,《金融研究》,2018 年第 7 期。
- [48] 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管理世界》,2005 年第 7 期。
- [49] 章元、刘时菁、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经济研究》,2011 年第 2 期。
- [50] 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管理世界》,2015 年第 2 期。
- [51] 郑伯坝:《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6 年第 2 期。
- [52] 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 年第 1 期。
- [53] 祝振铎、李新春、叶文平:《“扶上马、送一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战略变革与父爱主义》,《管理世界》,2018 年第 11 期。
- [54] 庄贵军、席西民:《关系营销在中国的文化基础》,《管理世界》,2003 年第 10 期。
- [55] Alesina, A., & Giuliano, P. 2011. Family ti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5: 817-839.
- [56] Bhardwaj, A., Dietz, J., & Beamish, P. W. 2007. Host country cultural influenc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 29-50.
- [57] Bliese, P. D. 1998. Group size, ICC values, and group-level correlations: A simulatio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4: 355-373.
- [58] Chan, C. S. 2009. Invigorating the content in so-

cial embeddedness: An ethnography of life insurance transactions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 712–754.

[59] Chen, T., Kai-Sing, K. J., & Ma, C. 2020.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Journal*, 130: 2030–2064.

[60] Chua, R., Huang, K. G., & Jin, M. 2019. Mapping cultural tightness and its links to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and happiness across 31 provinc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4: 6720–6725.

[61] Driscoll, J. C., & Kraay, A. C. 1998.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 549–560.

[62] Eisinga, R., Grotenhuis, M., & Pelzer, B. 2013. The reliability of a two-item scale: Pearson, Cronbach, or Spearman-Brow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8: 637–642.

[63] Gelfand, M. J., Raver, J. L., Nishii, L., Leslie, L. M., Lun, J., Lim, B. C., Duan, L., ... Yamaguchi, S.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 *Science*, 6033: 1100–1104.

[64] Giddens, A. 1986.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65] Granovetter, M. S.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66] Harrington, J. R., & Gelfand, M. J. 2014. Tightness-looseness across the 50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2: 7990–7995.

[67] Hinkin, T. R., & Tracey, J. B. 1999. An analysis of variance approach to content validatio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 175–186.

[68] Hinton, P. R. 2004. *SPSS Explaine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Inc.

[69]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 Minkov, M. 2010.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Revised and Expanded 3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70] Hu, A. 2017. Radius of trust: Gradient-based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8: 147–162.

[71] Ji, J., Huang, Z., & Li, Q. 2021. Guilt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The case of the privatization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4: 1969–1995.

[72] Khanna, T., & Palepu, K. 2000. The future of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Long-run evidence from Chi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 268–285.

[73] Kitayama, S., Conway, L. G., Pietromonaco, P. R., Park, H., & Plaut, V. C. 2010. Ethos of independence across re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duction-adoption model of cultural chang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 559–574.

[74] Li, S. X., Yao, X., Sue-Chan, C., & Xi, Y. 2011. Where do social ties come from: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governmental tie distribution among Chinese manager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 97–124.

[75] Li, X., & Liang, X. 2015. A Confucian social model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s among Chinese private-firm entrepreneu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 592–617.

[76] Napoli, J., Dickinson, S. J., Beverland, M. B., & Farrelly, F. 2014. Measuring consumer-based brand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7: 1090–1098.

[77] Neys, J., Jansz, J., & Tan, E. 2014. Ex-

ploring persistence in gaming: The role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7: 196-209.

[78] Oishi, S. 2014. Socioecological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 581-609.

[79] Peng, Y.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 1045-1074.

[80] Putnam, R., Leonardi, R., & Nanetti, R. 1994. *Making Democracy Working: Civic Tradition and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1] Quer, D., Claver, E., & Rienda, L. 2011. Political risk, cultural dist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rge Chinese firm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4: 1089-1104.

[82] Rentfrow, P. J., Gosling, S. D., & Potter, J. 2008. A theory of the emergence, persistence, and expression of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339-369.

[83] Sampson, R. J., Raudenbush, S. W., & Earls, F.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5328: 918-924.

[84] Schulz, J. F., Bahrami-Rad, D., Beauchamp, J. P., & Henrich, J. 2019. The church, intensive kinship, and global psychological variation. *Science*, 6466: 5141.

[85] Tabellini, G. 2008. Presidential addres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 255-294.

[86] Talhelm, T., & Oishi, S. 2019. Culture and ecology.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119-143.

[87]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6184: 603-608.

[88] Triandis, H. C., Bontempo, R., Leung, K., & Hui, C. H. 1990.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cultural, demographic, and personal constr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 302-318.

[89] Tsui, A. S., & Farh, J. L. 1997. Where guanxi matters: Relational demography and guanxi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ork and Occupations*, 1: 56-79.

[90] Tung, R. L. 2008.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mperative: The need to balance cross-national and intra-national d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 41-46.

[91] Uskul, A. K., & Over, H. 2014.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in cultural context: Evidence from farming and herding communit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 752-771.

[92] Vandello, J., & Cohen, D. 1999. Pattern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7: 279-292.

[93] Van de Vliert, E., Yang, H., Wang, Y., & Ren, X. P. 2013. Climate-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 589-605.

[94] Verhoef, P. C. 2003.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fforts on customer retention and customer shar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67: 30-45.

[95] Wei, W., Lu, J. G., Galinsky, A. D., Wu, H., Gosling, S. D., Rentfrow, P. J., ... Wang, L. 2017. Regional ambient temperature is associated with human personality.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 890-895.

[96] Willis, S., Clarke, S., & O'Connor, E. 2017. Contextualizing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By-Exception-Active in safety-critical context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

chology, 9; 281-305.

[97] Yang, G.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Lin, T. Y. , Tseng, W. S. , &

Yeh, E. K. (eds.) .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 Intra-National Culture? The Index Development, Heterogeneous Distribution and Impacts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cross 31 Provinces in China

Puchu Zhao¹ Xin Qin¹ Chen Chen¹ Wanlu Li¹ Jian Guan² Yuqing Gan¹

(1. Sun Yat-sen Business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haxu geju)”,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fundamental culture pattern of Chinese social re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oncepts to analyze Chinese local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phenomena. Prevailing literature regard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s an overall cultural fe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ssuming that it distributes homogeneously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However,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s a culture could display an intra-national variation within China. Drawing upon culture evolution perspective, we prese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region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emerges and persists with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the vari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First, we suggest that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past shapes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the modern day through shaping people’s specific subsistence styl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degree of farming economy and Confucianism in history would emerge higher degree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Second, becaus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ould improve cohesion within in-group members and decrease inclusion for out-group members, i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to region development in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ic, society and technology.

Methodology: In empirical stage, we first developed a regional-level measure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This measure includes four steps: First, divid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 into four categories (i. e., family, familiar person, acquaintance, and stranger). Second, using conception “trust” to approximately measure a wide range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Third, adopting Regression Slope Measurement to calculate individual trust radius to represent individual score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Fourth, aggregating individual score to regional level to acquire score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This measure has advantages in reliability, validity, data availability and calculation simplicity. Based on this measure, we used data from CGSS 2010 to test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with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cross 31 provinces.

Finding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our prediction in general. Firs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across 31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variation is explained by three regional factors: farming economy, Confucianism, and temperature clemency. Second, this variation can widely explain the 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in-

Contents

dex, including citiz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ivate entrepreneu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rime rate, social adap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tput.

Value: With such findings, our research is the first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and methodological tool to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within China, which makes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First, we relax an assumption in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distributes homogeneously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and reveal region as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ory about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Second, we develop a measure method which is easy to us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to measure regional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hird, our research also provides a parsimonious explanation for numerous disparate phenomena across 31 province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ic, society and technology outcomes.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ances, it may need t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local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when formulating policies (for example, talent policy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troduction policies). For the firms,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when make trans-regional strategic decisions (for example, market entry decision and manager delegation decision).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Region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may exist within a province. Future research could build related index in city level or community level. Second, our research uses cross-sectional data. Future research could employ longitudinal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s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hird, as exploratory research, our research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could adopt more rigorous inference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causality.

Key Words: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ulture; reg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trust; empirical measurement development